

东方 哲学 概论

主 编

任厚奎 罗中枢

DONGFANG
HE XUE
GAI LUN

川大学出版社

东方哲学概论

任厚奎 罗中枢 主编

任厚奎 李毓荃 编著
朱森溥
李于彪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成都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罗庆华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罗庆华

东方哲学概论

任厚奎 罗中枢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本 16.63印张 384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ISBN 7-5614-0396-8/B·28 定价：5.30元

导　　言

《东方哲学概论》是一部概述东方哲学孕育、形成、发展、繁荣和演变的历史，实际上是东方哲学的发展简史。东方哲学是人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同其他哲学一样，有着共同的规律，遵循共同的原则，具有共同的意义，但是，她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有必要对东方哲学史的对象、框架、特点、研究原则，以及研究东方哲学的意义等问题作一番阐述。

一

“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人们习惯于称欧、美是西方世界，而把地中海以东的亚洲、乃至北非称为东方世界。“东方哲学”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的，正如西方哲学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创造的哲学一样，东方哲学是东方世界的人们长期共同创造的哲学。她于公元前三千多年开始孕育、形成，公元前6世纪左右走上兴旺发达、独立发展的道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东方哲学仍然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其基本问题仍然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东方哲学史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最一般规律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

哲学史是“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就揭示了哲学史与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属性。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仅限于各自所属的领域，是对特殊的、局部

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哲学史则是人们认识整个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历史，因而哲学史与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是有区别的。

哲学史是人们认识整个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研究哲学史就必然要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

东方哲学自诞生以来，主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存在状况如何？人能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人生的目的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等等。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反映论与先验论、决定论与宿命论、幸福主义与苦行主义等不同的派别。东方哲学史揭示了各派哲学相互对立和斗争、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基本线索和规律，从而反映了哲学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她既是认识史，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相互对立的历史。但是，哲学史的内容丰富多彩，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虽然为其主线，却不能仅归结为它们的斗争。因为除了其间的彼此斗争外还有相互联系和贯通的一面，而且各种哲学派别内部也存在着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批判与继承等关系。

二

东方哲学主要包括公元前三千年至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以前的印度、阿拉伯、中国、日本、朝鲜等民族的哲学。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它们于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左右，先后创立了奴隶制国家，孕育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化。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哲学总是一定经济基础

的反映的原则以及各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可将东方哲学史分为东方哲学的开端、东方哲学的发展、东方哲学的繁荣及东方哲学的演变四个时期。

远古至公元前3世纪是东方哲学的开端时期。在古埃及和巴比伦，《太阳颂》、《尼罗河之歌》、《阿叔巴尼帕》等颂诗中提出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坚信太阳是万物的创造者。尼罗河是生命的源泉，产生了怀疑神灵的哲学思想；《普塔霍特甫的教训》、《伊甫味箴言》等记述了道德教训以及快乐论与悲观论的对立。在中国，殷商时期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在《易经》中展示了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光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儒、法、道、墨等诸子百家哲学派别，围绕着“天人关系”、“名实关系”、对立统一等问题展开斗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代哲学高潮。在印度，出现了《吠陀》、《奥义书》等婆罗门教的经典，形成了崇拜吠陀的六大哲学派系以及作为婆罗门教哲学反对派的顺世论、耆那教、佛教，这些哲学派别围绕着对《吠陀》的态度、“梵”、“我”、“流变”、“因果”、“轮回”、“解脱”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3世纪左右是东方哲学的发展时期。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及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大国的形成，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在注释前人经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哲学派别或宗派。在印度，由于统一的孔雀王朝与笈多王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佛教在三次大集结基础上使“经”、“律”、“论”三藏定型并形成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吠陀哲学各派理论家均创立了自己的经典，形成了严密的体系；顺世论唯物主义也进一步发展。印度九大哲学派别围绕着宇宙本原、梵我关系、因果关系、有无自性、轮回解脱等问题相互渗透、相互斗争。在中国，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结束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魏晋南北

朝产生了玄学（此时佛教传入中国）。虽然从秦汉至隋唐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却涌现出了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一大批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时期的哲学家围绕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动静关系、因果关系、感性认识与直觉顿悟等问题展开了斗争。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与早已流传在此的希腊哲学、伊朗哲学等结合，形成了阿拉伯哲学的主要流派：凯拉姆哲学、苏非派哲学、精诚同志社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涌现出了阿尔·铿迭、阿尔·法拉比、伊本·西那以及安萨里等著名哲学家。这时期的阿拉伯哲学在有神论与泛神论、世界的来源和状况、前定论与意志自由论、单一真理论与二重真理论、人生目的等问题上展开斗争。在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了6世纪以前神道教统治意识形态的状况。公元522年佛教传入日本后，很快取得了统治地位。八百年间，佛教在日本先后形成了十多个大宗派，垄断了日本意识形态领域。

公元8世纪至19世纪是东方哲学的繁荣时期。在印度，7世纪以后由于连续三次的外族入侵和统治，传统文化遭破坏，佛教灭亡，东部佛教徒进入西藏，哲学日益衰退。为巩固印度正统信念、建立统一的民族精神，遂产生了类似于中国朱熹哲学的、集印度各家哲学之大成的商羯罗的“不二论吠檀多”哲学，这是印度古代最有影响的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国在11世纪以后，儒释道三者合流，产生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涌现出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等古代哲学巨人，他们围绕理、气、心、性、知、行、人欲、天理等问题展开争论，形成了封建社会罕见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和唯物主义体系。阿拉伯帝国虽在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发扬光大，产生了伊本·路西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唯物论体系以及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哲学体系，把阿拉伯哲学推向繁荣昌盛的阶段。日本在室町和德川幕府时代，宋明理学取代了佛教哲学的统治地位，朱子学登

上官方哲学的宝座，阳明学广为下层群众接受，成为农民起义的理论武器。同时儒家古学兴起，伴随着尊王思想的增长，提倡“大和魂”、“日本精神”的日本国学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与此同时，安藤昌益等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形成了各自的体系。上述哲学派别的形成和斗争，标志着日本哲学的繁荣。

公元18至20世纪是东方哲学的演变时期。由于各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除日本外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东方各国爱国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富国强兵，高举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旗帜，掀起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他们力图从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为古老的东方哲学增添了西方哲学的新血液，促成了东方哲学的演变。阿拉伯产生了“大伊斯兰主义”、进化论、平衡论、实证主义、存在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印度兴起了罗易的泛神论、改良主义，辨喜的“实践吠檀多”哲学，奥罗多宾的“整体吠檀多”哲学和社会进化论，泰戈尔的“普遍和谐”哲学、甘地的“真理”和“非暴力”哲学。中国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放眼世界和救亡图存的主张。此后，西方的进化论、经验论、唯理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和观点，数十年间在中国广泛传播。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因西周移植西方哲学，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开始在日本广为流传，产生了日本的实证主义、纯粹经验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日本伏尔泰”、“东洋卢梭”，同时掀起了启蒙运动。

三

东方哲学产生于东方各国，由于东方文化以及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作用，东方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呈现出如下若干特点：

（一）东方古代哲学内容丰富、绚丽多彩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哲学是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西方奴隶制的历史进程较短，资本主义制度发生较早、发展充分，最具典型性，因而西方近代哲学比较繁荣。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不典型，因而其哲学也不很发达。但是，东方古代社会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而且发展很充分，所以古代哲学光辉灿烂、绚丽多姿。古希腊哲学堪称繁荣，但绝未超过东方哲学，且不说东方古代哲学早于西方二千多年，单就哲学的内容、形式以及思想深度来说，印度古代哲学和中国先秦哲学所达到的水平也是令人惊叹的。

（二）东方哲学属于类型保持型哲学

东方哲学均有承袭数百、数千年的特点。西方哲学则重批判，常常是师出同门而主义各异，或者同一主义也相互批判、各有分支。在东方，哲学派别一经形成具有较牢固的稳定性。中国儒家延续二千多年，日本哲学中佛教哲学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印度吠檀多哲学延续了三千多年，至今尚有活力。阿拉伯哲学自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凯拉姆派、苏非派、精诚同志社、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派别相继登台，直至阿拉伯帝国灭亡，七百多年其哲学派别基本不变。

（三）东方哲学注重人生研究

西方哲学注重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倾向极其显著。东方哲学虽然也研究自然，但重点在于研究人生，研究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实践及人生幸福和归宿。东方世界所产生的三大宗教和各国地方性的宗教影响非常深远。它们都有一套道德行为规范，教导人们避恶从善以通向天国乐园、或进入涅槃境界。宗教的影响渗透到哲学领域，形成了注重人生的特点。例如，印度哲学中有两个重要命题：“梵我同一”，“轮回解脱”。梵作为神或宇宙灵魂同个体灵魂（我）融为一体，实现个人及其灵魂解脱，获得真

正的幸福。阿拉伯各派哲学都讲亲近真主，追求永远幸福的目标。苏非派与精诚同志社以苦行禁欲和“爱”的力量追求人生幸福；法拉比主张通过知识、道路、技能而获得幸福。巴哲和图斐利宣扬离群索居的生活道路谋求幸福。中国哲学讲“天”、“人”，主张爱人。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进而制定“三纲”、“五常”，把哲学、伦理和政治融为一体。

（四）东方哲学具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强调知识，重视理性，而非理性主义则强调直观、内省、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浓厚，无论古代和近代哲学基本上都是理性主义哲学；现代西方虽然有一股非理性主义思潮流行，但理性主义仍属主流。

东方哲学则相反，非理性主义十分突出。这一特征仍然与宗教影响分不开，宗教总是颂扬创世说、启示真理、灵魂不死、天国地狱说等等。宗教信仰本身就是非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启示真理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佛教的顿悟，苏非派的入神状态，神秘主义、神智学等都是非理性主义。这一切无不带到哲学领域中来。印度古代称哲学为“见”，即洞见，就是一种靠神秘直觉而对宇宙的沉思。商羯罗的“智”也是一种直觉知识，辨喜的认识道路之一就是直觉，是“主观默想看见内在的东西。”中国的老庄讲“静观玄览”，玄览即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意，也就是神秘的直观。就连荀子也讲“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要求排除杂念，精心专一，进入“大清白”境界。玄学家郭象为满足“超然心悟”的需要，以直观的方法达到“冥”的境界。张载是唯物论者，他也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通过道德修养便可“穷神知化，与天为一”。^①阿拉伯哲学家几乎都是非理性主义

①《正蒙·神化》。

者，其认识论的最高成就——“双重真理论”也肯定了真主的启示作用。可见，非理性主义在东方哲学中非常普遍。

（五）东方哲学同宗教结下不解之缘

西方哲学除中世纪外，无论古希腊哲学，近代的经验论、唯理论、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亦或现代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宗教并且摆脱了宗教的桎梏。

东方哲学则不同。首先，各国哲学几乎都是在宗教的怀抱里孕育形成的。古埃及崇拜太阳神，把太阳视为宇宙的根源。中国早期哲学是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殷人崇拜天帝、虞信先王祖宗等鬼神，透过宗教、巫术、卜巫的记载，可见到最早的阴阳、五行之说。《易经》哲学亦蕴含于卜巫之中。印度最早的弥曼差、吠檀多、数论等六派哲学，都源出于婆罗门教的《吠陀》。阿拉伯主要哲学派别源出于伊斯兰教。其次，也是其更为主要的表现，在于东方哲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长时期未能同宗教相分离。所以，永田广志称，“在日本，哲学思想，作为宗教思想产生以来，长时期没有从宗教分离出来。”日本哲学“有时长期地作为佛教理论，有时作为通过吸取佛教和儒教思想而形成的神道理论继续存在下来。”^①印度著名哲学家德·恰托巴底亚耶也指出：“我们的哲学思想没有能从一切宗教迷信、神话想象、甚至对于典礼仪式的信仰中完全解放出来。”在印度，“宗教与哲学没有完全分离。”^②中国哲学在其发展中同宗教的关系，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统治中国很长时期的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者合流的产物，即承认理学同佛教、道教有着血肉关系。任继愈先生主张，汉代以后的儒家就是宗教。他指出：“封建社会，哲学只是宗教的附庸。中外的历史都已表

^①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12页。

^②《印度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31页。

明哲学没有能力从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下解放出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哲学从属于宗教的这种状态也特别久。”汉代以后，封建统治者们使儒学“朝宗教神学方向发展。他们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学经典神圣化，到了宋代又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学变成了伟大思精的宗教神学。”^①如果此论点能够成立，则应承认中国哲学也是长时期同宗教神学血肉相联的。

四

东方哲学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和研究东方哲学，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观点和材料相统一的原则；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一致的原则；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普遍联系和内在发展相统一的原则。

(一) 必须坚持观点与材料统一的原则。所谓观点，是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材料是指东方哲学的原著资料。坚持二者统一的原则，就是要用观点统率和指导材料，用材料说明和论证观点。为此，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所谓“六经注我”，搞纯粹的材料注疏、注释和分析，只见材料不见观点，把人们的注意力和创造性禁锢在或淹没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中，不能给人以启迪的思想结论。二是错误地理解观点指导材料，搞“我注六经”，用某种先行建构的框架、主观臆想的公式去生搬硬套和任意剪裁资料，为我以用，胡乱推论，不顾古人的结构体系和风格特点，千人一面地填写到人为设计的表格中去。对于东方哲学，这第二种倾向尤其应该注意，既不能硬套哲学教科书的模式，也不能完全生搬硬套西方哲学的框架，一定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

^①《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3—14页。

求是地发掘和分析，保持东方哲学的特殊性。

(二) 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一致的原则。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他又说：“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的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认识的维护者与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① 东方哲学史的研究必须遵循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自始自终抓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这根主线，以把握其发展的规律性，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因此必须坚持反对公式化、简单化，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图式描绘成千篇一色的斗争画面；同时也反对取消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倾向。对于后者，近十年来有漫延的趋势，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讲党性原则，强调党派斗争，不是只讲本体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而应该包括对列宁说的“超感觉认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否定客观真理与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等，其内容十分丰富十分复杂，绝不是简单的两军对垒、不可逾越。譬如“超感觉认识”，有宗教的、唯心主义的直观认识，有神秘主义的冥想、入神、顿悟，也有唯物主义者的直观和非理性主义倾向，甚至包括理性主义者的“天赋观念”，因为它取消和超越感官的认识。因此，首先必须承认其复杂性、多样性。其次还应指出，党派斗争有的是明显的、典型的，有的则不具典型性，而只有某种相似性。譬如列宁曾经讲过，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相似于、近似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128页。

的斗争。①这种形式的斗争在东方就更为普遍。否则，欧洲中世纪就没有党派斗争，阿拉伯哲学中也没有党派斗争，因为那里的哲学家都承认上帝或真主创造世界和人类，即精神决定物质，因而都是唯心主义者。此外，我们讲斗争也要讲同一、统一，否则就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常常说唯物主义体系中包含着唯心主义的因素，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合理内核”或“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等，就足以说明这种统一、同一。就其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而言，必须承认两种对立党派还存在互相贯通、互相吸收、互相转化的倾向。

在强调哲学党性的同时，必然要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因为党性是其阶级性的表现，阶级性则是其党性的实质。但是，作为构建某种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在反映阶级意志的问题上有的是自觉的，有的则是不自觉的。而后者在历史上往往是大量存在的。同时，不同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需要什么哲学，只能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哲学宝库中去寻找并加以选择和扶植，为己所用。有时一个阶级、阶层选择一种哲学，有时几种哲学并用，此一时用这种哲学，彼一时又用那种哲学。所以，不能机械地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仅仅归结为某种进步或反动阶级的哲学，一定要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导致本来是革命的农民阶级、早期资产阶级，因以宗教、唯心主义为思想武器而得出“反动阶级”的荒谬结论。而且一种哲学并不一定只服务于一个阶级，印度吠檀多哲学曾为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所采纳。中国的阳明学在中国服务于地主阶级，在日本则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

(三)必须坚持批判和继承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恩格斯说：

①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 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传播以前的东方各国哲学，无论其古代哲学亦或是近代哲学，本质上都是剥削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总体上看，也都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如何对待这种哲学遗产，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是坚持历史主义还是非历史主义？是批判继承还是全盘否定或者盲目颂扬？我们主张坚持历史主义和批判继承原则。东方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的瑰宝，但它又是剥削阶级的哲学。因此，一方面必须继承，一方面又必须批判，通过鉴别、分析，批判地继承。我们讲批判，是辩证的扬弃，不是根本不要、绝对抛弃，而是将其中积极成果、合理因素大胆采纳和继承；讲继承，不是不分是非、无分析、无鉴别地一概接收。因此，我们既反对盲目颂扬历史、崇拜古人的非历史主义，又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

（四）必须坚持普遍联系和内在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普遍联系和内在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哲学史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东方哲学史上的普遍联系，就是要把历史上各种哲学的产生、发展以及被别的哲学所取代等等，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找出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阶级、科学、文化等因素的联系，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就哲学论哲学。东方哲学还有着特殊的复杂性，无论其理论来源、哲学类型均不竟相同，具有非单一性的特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型态；日本哲学受中国的影响，从中国接受了佛教和儒学；而阿拉伯哲学又主要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的。东方哲学的内部有区别也有联系，必须重视这种联系，从中探索共同规律。我们讲东方哲学的内在发展，是要考察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发掘、总结哲学不断进步的主要线索及其基本规律，找出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让哲学的历史呈现出栩栩如生、层次分明和色彩斑斓的思想画面。因此，充分重视、切实考察哲学史同科学史、宗教史、伦理史、逻辑史及政治思想史的密切联系，在联系中揭示发展的规律性，是非常必要的。

五

东方哲学是全人类也是东方人民的宝贵财富，研究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东方人研究东方哲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面向全世界的中国研究她，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一) 研究东方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全部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哲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却又是人类哲学发展的高级阶段。通过东方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无比的先进性、革命性，从而坚定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同时东方哲学中也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这是东方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东方的土壤，而东方工人阶级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基础。因此，研究东方哲学，有利于破除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东方的种种谬论，增强东方人民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心。

(二) 研究东方哲学有助于开拓视野，拓宽我们的知识领域，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人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天赋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

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东方哲学史源远流长，思想丰富，是锻炼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要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理论素质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中国要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绝不应囿于西方，而应包括东方一切国家。不了解东方，不懂得东方哲学及其政治、经济的现在和过去，达不到相互学习和借鉴之目的。

(三)研究东方哲学史，有助于打破西方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东方之后，西方哲学广泛流传于东方世界。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大学讲坛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外尚无东方哲学的席位。在外国哲学的栏目中，只有西方古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西方现代哲学，客观上形成西方哲学独霸讲坛的格局，东方哲学在中国鲜为人知，更谈不上赋予她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东方哲学不仅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西方哲学的源流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没有古代的东方哲学与宗教，就不会有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没有阿拉伯哲学，就不可能使西方哲学完整地保存下来，甚至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家就难以真正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见，东方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年成为其俘虏。因此，研究东方哲学对于打破西方中心论、西方哲学优越论，抵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腐蚀毒害年轻一代，反对资产阶级人生哲学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研究和学习东方哲学，可以弘扬东方文化，增强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东方哲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